

## 为什么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很重要？

包弼德 (Peter K. Bol)

自古以来，确切地说从大约2500年前孔子的时代开始，为政府做事和阐明政府存在的理由是有区别的。为政府做事，需要能够监督政府在军事、司法和税收等方面的行政管理人员。公元前3世纪时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使行政人员从具有贵族地位、往往也拥有独立势力的人，转变为通过为体制利益服务而获得晋升机会的官僚。起初，阐明理由只是一个惯例。统治一个国家就需要有人熟悉能够将君主及臣子联系在一起的仪式和典礼，使统治者能够履行他作为活人和祖先之间，人类社会与宇宙之间的中间人角色。

然而，政治不只是关乎仪式而已。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关于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载体：写作。操办仪式是做事情，是一种有效的行动方式。写作可以描述和倡导有效的行动，却还差一步。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他说得并不太对，因为在文字间提出的主张往往会对行动和政治产生影响。一些诗人早前曾吟唱过：“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上帝伟大而又辉煌，洞察人间慧目明亮。监察观照天地四方，发现民间疾苦灾殃。……上帝经过一番考察，憎恶殷商统治状况。怀着宠爱向西张望，就把岐山赐予周王。）这并

非仅仅要证明公元前11世纪周朝推翻商朝的正当性，而是在提出一种观点，即维持政治权力—坚持“天命”—取决于统治的质量。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即周朝的统治者是可以被追究责任的，并否认天命授权是永久性的。这是挑战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韦伯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依赖“传统”来源的政权合法性，即人民服从国家的命令，仅仅是因为习惯，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本书中讨论了这一点。

因此，写作也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手段，但它的作用远远超过仪式。它令过去得以记录下来，也是公民秩序理念而非军事秩序理念的基础，同时令通过远距离通信，无论是公民还是军事手段，进行治理得以实现。写作者会宣扬王朝权力的合法性，但他们也会撰写文献，把最古老的统治者描绘成根据才能而不是世袭特权选出的人，同时还收集表达被统治者反抗统治者的声音的诗歌。

我们可以把那些为政府辩护的人称为“知识分子”，而不是官僚，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与政治权力分离。的确，可以公平地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那些在宗教组织之外以作家和思想家而闻名的人，大多都可能曾在政府部门服务过一段时间，并具有某种官方地位。

但是官僚和知识分子—也就是拥有政治权力并管理着政府的人，和那些思考和撰写政府应该做什么的人—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限于政治。正是在政治和社会分裂时期，知识分子超越了他们作为中间人的正常角色。他们成为了思想家。他们向统治者谈及应该如何统治，以及理想的政治秩序，并向个人讲述应该怎样成为有道德的人。他们认为有一种权威凌驾于统治者之上，而他们有能力和阐述这种权威，并为其辩护。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权威，政府和社会需要怎样变革以顺应这样的权威之类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唯一的答案。周朝的一些诗人提出一个答案，以该朝贤明的创建

者为榜样：“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上天行事总是这样，没声音没气味可辨。效法文王的好榜样，天下万国信服永远。）这一点在不同时期都得到了呼应，例如唐朝和明朝的开国皇帝，以及最近的毛泽东崇拜者，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是，也会出现其他可能性。大一统帝国的天道理论提出统治质量和自然状态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共鸣，因此在自然界本应稳定和可预测的过程中，任何异常现象一如地震或者不期而至的日食一都可以被解释为治理不善的迹象。面对这种解释的可能性，官员不得不选择如何应对。总的来说，政府的回应是尽力而为，但其反对者能够，而且的确在自然灾害中找到指责政府失职的理由，导致官员淡化甚至压制坏消息。这两种回应在中国最近的历史上都是显而易见的。

知识分子已经，并将继续，寻求其他权威来源。自公元前2世纪末司马迁对文明史进行了伟大的阐释以来，历史的撰写和重写就一直在进行。除了其他成就外，他展示了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是如何随时间流逝发展而来的，并且表明只有在理解问题如何产生的基础上才能逆转这些问题。此外，他还指出其统治者采取过去暴君的失败政策。1000年后，历史学家和反对派领袖司马光撰写了一部1500年以来的历史记载，表明一个王朝要想生存下去，最终必须要限制政府为能够改变社会以使之符合其理想模式的权力——这个理想模式是被其他在儒家经典中找到权威的分子早已提出的。相隔1000年后，历史学家钱穆发现中国中古时期（即司马光的时代）已经有现代社会萌芽的迹象，因为科举制度使普通百姓有机会当上宰相。对历史的诠释总是关乎当下的，或者说得更微妙些，是关于过去对现在的意义。这是一种需要继续或抵制的东西吗？历史是需要毁灭的遗迹，还是应被恢复其辉煌过去？谁是罪魁祸首？谁是值得钦佩的？关于历史的撰述几乎总是要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中。

直到最近，儒家经典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辩论的最大载体，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它们是关于文明起源的记载。（而从三

个世纪前开始，便有学者断定，一些文献虽然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不是傅罗文 [Rowan Flad] 在本书关于丝绸之路的一章中所指出的，现代考古学为我们提供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另一面。) 它们是政治和道德思想的基础，也是文学的基础。有些人认为这些各式各样的书籍是对只有古代才存在的理想的，完满的社会秩序的连贯突破—后来的时代都试图恢复这种格局，而却徒徒劳无功。与如此重要的文献相符合的是，知识分子发现就政府应该做什么，人们应该如何学习和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重新诠释经典。于是，经典被反覆地重新解释释，但是，当有人提出某种原本代表着反对声音的言论，如果它能够取得众多回响，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正统观念。每一位重要的评论家都认为，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最终是正确的。

在7世纪初的唐朝，朝廷是政治权力核心的观念成为对经典的新解读来源，这种解读试图综合已经分裂了三个世纪的北方和南方学者的诠释。但是对经典最重要和持久的这就是朱熹在12世纪以伟大的宋明理学的诠释。朱熹力图反对国家权力的扩张及其致力通过政府政策来改变社会。朱熹的评论之声所以具影响力，是因为它成为了考试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直到20世纪初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学校需要学习的一部分。政治政治的道路要经过教育—这种教育是知识分子的工作。通过考试并不代表受过教育的人必然信服他们所读的内容，但这些读物的确提供了一套共同的词汇和一副理解并应对事件的模板。然而，宋明理学的诠释所做的还不止于此，它将重点从令政治体系发挥作用，转换到培养具有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人。为做到这一点，它完全在哲学上占有所有人都拥有一种道德本性。，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而且还提出所谓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取代传统经典的首要的。根据宋明理学的解释，四书主要完善的不是政治制度，还是个人如何通过学习成为道德上负责任的行为者。

科举制度有着古老的渊源，但直到10世纪末才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渠道。这是一项评估才华的测验，而才华最初被定义为文学成就，后来又被定义为对四本书的诠释理解。与教育系统相结合，每个县都建立一所官学，还有数以百计的私学。蒙古人在13世纪征服中国后建立元朝，虽然大大限制了考试的作用，但也增加了对官学和私学的资助。在16世纪欧洲观察者的眼中，科举考试制度非常接近柏拉图让哲学家当国王的理想。虽然这是令人怀疑的，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能够使教育成为踏入官僚服务系统运作好的必要准备，也是相当非凡的。

但中国的强大或许可能关于（伴随着中古时期贵族制度的瓦解，商业的发展，以及文人和受高等教育的精英人士在本地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无论何时，成千上万的文人在没有获得官职的情况下就接受了科举制的教育制度，这确保全国各地的文人拥有相似的文化水平和共同的知识，并希望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考试教育只是一种职业气息十分薄弱的教育，因为它只是要求人们了解过去的文本和当前的诠释，并掌握复杂的文学形式。这更接近孔子和其后的儒家学派说的“为己”学习，而不是“为人”学习。科举制的教育注重理性和批判性思维，拓宽视野和对历史的深入了解，道德的挑战和选择，更接近一种理想的并不具有科学的博雅教育。而不只是希望锻炼学生通过考试的能力。

因此，争论点始终是教育应该向那些求学的人灌输什么价值观。是仁和义吗？是忠（于国家）和孝（于家庭）吗？是格物与致知吗？但这也总是存在矛盾：在复古和创新、治国和齐家、建设制度和修身之间等。

在当代中国，这样的争论又一次公开出现。起初，分歧在于自由派主张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的选择自由，应该带来政治上的选择自由；而新左派则主张因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而导致持续增长的不平等，只能通过恢复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主义政

策来补救。然后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主张这将是  
中国独有的道路，暗示着这既不是自由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概  
念。他们声称中国之所以强大的关键在于其历史——一段曾被贬  
低为封建主义的历史。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权力问题：中国  
只有通过统治其他国家，才能恢复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对另  
一些人来说，强大要靠恢复建立在儒家价值观基础上的文明（  
尽管对于这些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还是威权主义的，还没有达成  
共识）。显而易见的是，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就像他们之  
前的知识分子一样，寻求政府对他们各自立场的支持，并将自己  
确立为能够引导中国未来的人。

今天，执政党的领导层决定既支持儒家思想，也支持社会  
主义。习近平主席访问北京大学时，与现今已故的儒家哲学家  
汤一介合影留念。汤一介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赖于儒家  
思想的复兴，而习近平也就儒家著作《大学》作为社会主义价  
值观的基础发表过讲话。大学中的“国学”机构从政府获得充  
足的资金。对于以其他文明和历史经验为基础批评政权的知识  
分子来说，这是个不好的时期。但对于那些受过中国人文教育的  
人来说，这是一次机遇，可以为自己确立权威的价值观诠释者  
地位。他们诠释的价值观将使中国真正地成为中国，从而使他  
们成为政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

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就表明其一直致力把政府工作（这  
需要官僚和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 effort 结合起来。有时候，当  
权者也会从知识分子手中夺取对教育的控制权，并就价值观展  
开讨论。但在过去1000年里，更常见的模式是，政府一方面承  
认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运动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亦试图  
拉拢知识分子成为支持者，而不是批评者。然而，当个人教育  
被视为取得政治成功的必要条件时，在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威之  
间的紧张局势就会难以避免。也许我们应当说，这就是在中国  
建立的文明本质。